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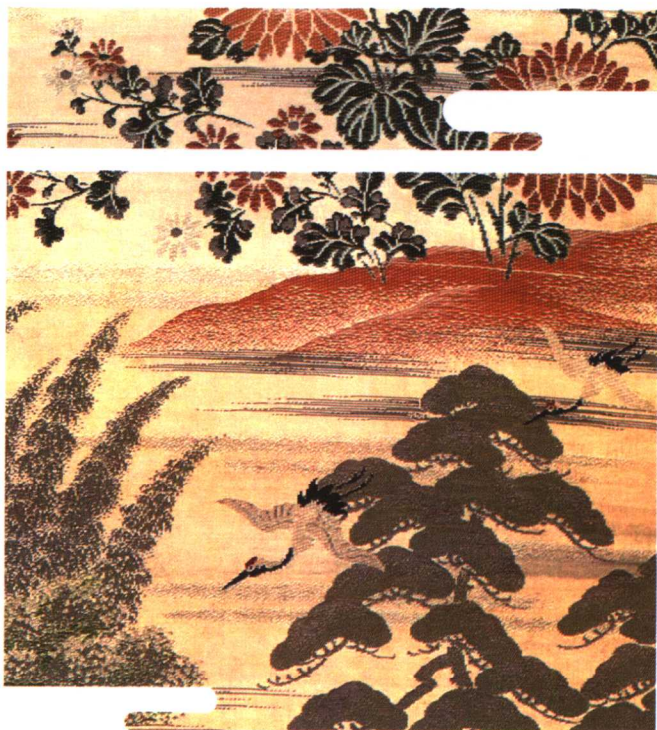
日本中國學文庫

王晓平◎主编

唐宋诗文的 艺术世界

〔日〕 笈文生 笈久美子◎著

卢盛江 刘春林◎编译 刘雨珍◎校正



中華書局

日本中國學文庫

王晓平◎主编

唐宋诗文的艺术世界

〔日〕笈 文生 笈久美子◎著

卢盛江◎译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诗文的艺术世界/(日)笈文生,(日)笈久美子著;卢盛江编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7.10

(日本中国学文萃)

ISBN 978 - 7 - 101 - 05074 - 5

I. 唐… II. ①笈…②笈…③卢… III. ①唐诗 - 文学研究 - 文集②古典诗歌 - 文学研究 - 中国 - 宋代 - 文集③古典散文 - 文学研究 - 中国 - 唐代 - 文集④古典散文 - 文学研究 - 中国 - 宋代 - 文集 IV. I207.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4049 号

-
- | | |
|-------|---|
| 书 名 | 唐宋诗文的艺术世界 |
| 著 者 | 〔日〕笈文生 笈久美子 |
| 编 译 者 | 卢盛江 刘春林 |
| 校 正 | 刘雨珍 |
| 丛 书 名 | 日本中国学文萃 |
| 责任编辑 | 王守青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0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 226 千字 |
| 印 数 | 1 - 4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 05074 - 5 |
| 定 价 | 24.00 元 |
-

总 序

王晓平

日本人(包括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迁徙到列岛的人们及其后裔),至少从我国南北朝时代便揭开了研读中国典籍的历史,而伴随中国文化进入日本所产生的一系列文化现象,诸如写经抄书、创造假名、宫中讲经、发明训读、朗咏流行、设明经文章诸科博士、藏典修史等等,构成了人类文化交流史上壮观的奇景。日本人审视中国的同时,也在成就着自身。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从广义上讲,日本人研究中国,几乎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岁月,但学界真正把研究中国的学问称为“中国学”,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

长达一千五百年以上的中国研究史,是与日本文化的开创和发展紧密联系的。尤其在近代以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完全抛开中国学术史,便没有完整的日本学术史可言。但是,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研究中国的目的、方法和态度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尽管中国传统的考据学、文献学的影响依然存在,但与西方学术同时也与本土固有文化研究建立的联系,远比与中国同时学术的联系敏感、紧密而又牢固。不论如何,从古至今,日本学界产生了众多研究中国的大学问家和名文名著。

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与中国自身的学术研究最大的不同,就是主导这门学问的根本课题,是岛国日本如何面对大陆中国。它

们不仅植根于异质的文化土壤,从属于日本文化体系,反映或者作用于当时日本的包括民族主义思潮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在日本学界获取评价,而且根本目标在于发展日本文化。所以尽管它们有时与中国本土学问面临着同一对象,然而两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和价值。

在世界文化走出各自分割历史阶段的今天,国外中国学与中国的国学共同构成世界的学术中国观,而又各属不同的学术体系,发挥着不同的文化功能。对于我们的国学来说,国外的中国学可以说是不宜回避的“他者”,日本的中国学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进一步说,日本中国学除了具有其他国家中国学的共性之外,还有一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离不开一个“近”字。例如,由于许多业已散佚的中国文献通过抄本或者刻本保存在日本,使得日本成为域外最重要的中国文献资料库之一;又比如日本拥有传统的阅读和训释中国文学的特殊手段等等,这给中国文献的传播和解读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同时,由于中日两国学术交流源远流长,日本中国学与日本学研究的关系特别紧密,也使得它在考据和比较研究这两方面,有着更多的资源和课题。

在日本,对日本古代学术文化的研究,常常不能与对中国的研究一刀两断,再加上现代学术谋求沟通的大趋势,便使得日本中国学者,例如内藤湖南、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人的著述的影响超出了中国学的范围;另一方面,某些研究日本学的著述,例如明治时代的民俗学家、最早的环境保护运动力行者南方熊楠,有“知识巨人”、“时代代言人”之称的加藤周一,“文化功劳者”称号获得者

中西进等人著述中涉及到中国学的部分,也都有一读的价值。

日本近代以来在某些研究条件或手段上不同于中国本土,日本学人多重实闻亲见,不尚空谈,长于细读深究。他们在某些领域,例如中国宗教文化、敦煌文学、中外关系史、艺术史以及中国戏曲小说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曾给中国学人以启迪。日本从奈良、平安时代起逐渐形成一些接受中国文学的热点,如《文选》、《白氏文集》、《唐诗选》、《古文真宝》等,对这些作品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成果,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有着互补互鉴的作用。这些都使得中国学者对日本中国学报以热眼。学人多以“他山之石”、“邻壁之光”来强调这种关注的借鉴意义。

与此同时,中国学术界又从很早便有了对盲目追随日本学人态度的批评。早年章太炎先生对这种态度给予的辛辣讽刺,虽不免言之有偏,却仍不失警戒之功。前辈学者对于当年那些所谓“支那通”的揭露,更不该忘记。在中国学者对日本中国学展开系统研究的时候,仍有必要反对任何形式的食而不化与人云亦云现象,强调中国学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统一,葆有学术自信和识别眼力。

今天,更要看透那些变样翻炒“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的所谓“中国通”,他们往往将历史和现实作短线连接,凭借现代媒体和出版业,朝论夕改,张大偏见,仅就学术手法而言,也实不足为训。应该说,这些人虽然不是日本中国学界的主流,但是他们头上也顶着“大牌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和“社会名流”的帽子,近年来忙不迭煽乎所谓“厌中”(讨厌中国)情感,就很有些拉着舆论走的能量。

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我们对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价值,绝不止于“借鉴”,也不应该停留在“此优彼劣”的结论上。对日本来说,日本中国学是日本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从整体上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某一时期日本人的中国观、中国形象、中日关系。日本的知识界,往往通过它们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专家们,以及有些并非专门研究中国的思想者写的关于中国的著述,对短期或者较长期的社会思潮,有时甚至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都起过某种作用。言说中国的学术话语与官方话语、媒体话语及民间话语等共同营造着中国形象,而其中学术话语的影响则更为长久深远。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学人来说,通过这些著作来了解日本文化、认识日本人、解读日本人的中国观,或许也不失为一条途径。同时,我们对日本社会文化看得越透彻,就可能对日本中国学研究得更为深入。

总之,在中日文化双方不能不互相正视的今天,对待格外重视师承流派、积淀深厚、做派繁复、多变多样的日本中国学来说,草草一瞥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原始察终,辨源析流,叩同问异,进而学会平等地与其展开卓有成效的学术对话。既是对话,那当然不是只“知己”就行了,还必须“知彼”,而且不是一般的“知”,而是要深知熟稔。所幸我们已经有了《日本中国学史》、《日本汉学史》等专门的著述,让我们看到了日本中国学乃至国际中国学研究的广阔前景。

国际文化交流发展到今天,在人们对吸收外来文化倾注着空前热情的时代,面对别种文化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显出更大的必要

性。这种声音,不是自说自话,而要有往有复。因而,加强对国际中国学的研究,必然会与我们的“中国学”走向世界相联系。在这一方面,日本学界可谓先行一步。为了推进国外的日本学研究,十多年以前,日本便建立了对外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最近又在法政大学中设立了国外日本学研究基地,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对国际日本学研究展开分析。以此反观我国知识界的一般认识,有些人多只看到那些操着怪腔怪调汉语的外国人在该国学界没成什么大气候,又爱发些对中国隔靴搔痒的议论,就轻看国际中国学研究的意义。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工作的紧迫性。

读书或可睹人。推进学术交流,化解误解误读,减少文化摩擦,出书、读书、品书与人员交流对话,是有力的两翼。我们阅读日本中国学著述的时候,如果不只停留在听他们述说什么,而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会那样说,和同时期中国本土研究有哪些不同,那么,这些材料就可能演化为我们拓展本土文化研究和外国文化研究两大领域更有用的思想资源。对于收藏在日本的中国文献,日本学者已经对文本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我国学者却常因为无法与原件谋面而深感遗憾。有些日本学者抱怨中国学者对日本存藏的中国文献抄本、刻本评价过低,而实际原因是这些资料一般中国学者很难看到。面对涉及各类学科的日本中国学著述,切实了解它们的最好方法无疑是阅读原著,而且是系统阅读,因为翻译有时难免会模糊两种文化的细微差异。然而,在很多有兴趣的学人还没有条件做到这一点的时候,翻译就显示着特殊的必要性。

我们选择一些篇幅不长、适于阅读的名篇名著、新人新作介绍给读者,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日本中国学的多种面孔。我们

在坚持学术规范的同时,也不应排斥学术研究的个性化与多样化,这些研究和写作方法的异色,或许能帮助我们扩大眼界。

我们这套丛书,没有选择像斯波六郎所著《文选李善注所引古文尚书考证》,或者太田次郎所著《以旧抄本为中心的白氏文集本文的研究》那样大部头的专著,它们学术价值很高而读者面很窄。这些书很重要,等条件具备,也应该译介过来。我们先要做的,是希望读者能认识一批比较好接近的客人,也就是一批学者为非中国学专业知识分子写的书。

日本一些研究中国学的名家,很重视为一般读者写书。吉川幸次郎曾提出让学问回归大众的口号,白川静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也强调在孤诣独往苦苦求索的同时,要努力使学问返回到“一般”,即回报于社会。像青木正儿等人文笔之好,在学界早有定评,他们关于中国文化的学术随笔脍炙人口,几十年来一直是书店的畅销书。

我们选择的书目,除了几部新人新著外,都是“大家”写的“小书”。或侧重其保留中国文献资料的价值,或侧重对中国本土研究的补阙,或侧重于对中日关系研究的历史作用,或侧重于其在日本学界的影响。取其一点,不必求全,积少成多,不拘一格,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通过这套丛书,读者便可陆续与那些久闻其名而未见其文的好友见面,共享日本中国学之景观。

目 录

李白隐于竹溪年考	笕文生(1)
李白与“竹溪六逸”	笕文生(8)
李白结婚考	笕久美子(21)
李白和高适	笕文生(39)
李白论	笕久美子(56)
关于李白的乐府	笕久美子(95)
“吹不尽”考——李白《子夜吴歌》札记	笕文生(128)
“绕床”考——李白《长干行》札记	笕文生(145)
李白《月下独酌四首》考	笕久美子(155)
以“女性学”观点试论李白杜甫寄内忆内诗	笕久美子(164)
“如麻”考——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札记	笕文生(173)
关于陈子昂散文的评价	笕文生(188)
关于张说的散文——唐代古文运动的源流	笕文生(202)
柳宗元《童区寄传》考	笕文生(215)
柳宗元诗考	笕文生(234)
梅尧臣略说	笕文生(259)
梅尧臣诗论	笕文生(276)
中国文学所描写的猫	笕文生(305)
编译后记	卢盛江(323)

李白隐于竹溪年考

一

李白(701~762)和杜甫(712~770)同为盛唐代表的诗人。但和杜甫相比较,李白一生的经历中还有很多未解之谜。这是我们对大部分现存的杜甫作品,大体上可以推定出它作于何时何地,但对李白却还有很多不明之处。

李白生于何地?他是几岁随父亲从西域到四川的?被当地人称之为“客”的李白的父亲又是从事什么职业的?李白在蜀地度过了他怎样的少年时代?他又是何时顺长江去的湖北?在安陆,他与曾任过宰相的许圜师的孙女喜结秦晋之好的来龙去脉是什么?李白与一般认为是他最后一位妻子的宗楚客的女儿又是在什么情况下结婚的?他漫游各地的目的究竟何在?旅游的费用又是如何筹措的?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学者都已发表了各种见解。可以说目前虽然有些问题已经查清或者已被部分查清,但还留有不少疑问尚待解决。



对于李白隐居山东徂徕山、被称之为“竹溪六逸”的年代，就很难说是已被充分查清的问题之一。我们知道，最初记载“竹溪六逸”的史料是《旧唐书·文苑传》：

父为任城尉，因家焉。少与鲁中诸生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等隐于徂徕山，酣歌纵酒，时号“竹溪六逸”。

《新唐书·文艺传》也几乎原封不动地承袭了《旧唐书》的记述：

更客任城，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徂徕山，日沉饮，号“竹溪六逸”。

但两《唐书》的这一记载，为何在两《唐书》之前发表的有关李白传记的基础史料中却是只字未提呢？也就是说在李阳冰的《草堂集序》、魏颢的《李翰林集序》、李华的《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刘全白的《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范传正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君新墓碑》、裴敬的《翰林学士李公墓碑》中的任何一文均未提“竹溪六逸”。

但是，从流传至今的李白本人的诗作中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一记载并不完全是虚构。在题为《送韩准裴政孔巢父还山》的诗中就能说明这一点。尽管在该诗中未见张叔明和陶沔的名字，但从诗中知道李白在鲁国的东门为韩、裴、孔三人返回徂徕山送了行。而且我们还能从该诗中的“昨宵梦里还，云弄竹溪月”两句看出两《唐书》的记载大致是可信的。

最早撰写的李白年谱，即南宋薛仲邕的《唐翰林李太白年谱》



的开元八年(720)的一条中,记述了李白会见益州长史苏颋一事,在其后又一记有李白在云梦与许氏结婚以及三年后去齐鲁作“竹溪六逸”之游的内容。但由于该年谱没有载明李白与许氏结婚的年份,所以李白何时游徂徕山一事最终还是不明确。现在我们假定依王琦之说把李白与许氏结婚之事定在开元十三年(725),那么,婚后第三年,也即是开元十六年(728)。这正值李白30岁(薛氏把李白的生年定为699年,比王氏之说早两年,此处以此为基准算出)。

清代王琦所撰写的李白年谱比薛氏之作内容更加详尽,在这个年谱中,“竹溪六逸”聚游徂徕山的时期定为李白与许氏结婚十年后的开元二十三年(735),也就是李白35岁之时。但是他却又加注“游齐鲁岁月不可详考,并附于此”。

在承袭王氏之说的王伯祥《增订李太白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一书中,“竹溪六逸”的记事后有“何时至齐鲁已不可详考”的加注。

詹锳的《李白诗文系年》(作家出版社,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1984年)一书对王琦之说作了一些修改。他在书中把李白与许氏结婚的年份定在晚两年,即开元十五年(727),李白27岁之时。他又将李白游徂徕山的时间,定在晚一年,即开元二十四年(736),李白36岁之时,并加注“王谱系东鲁之行于开元二十三年下,按白之至东鲁在五月,而是年秋间尚在太原,王说恐误,今改系本年”。我国青木正儿的《李白年谱略》(《李白》,集英社,1965年)和武部利男的《李白年谱》(《李白》,筑摩书房,1972年)两书均依从詹锳之说。

对王琦之说持有异议的是黄锡珪的《李太白年谱》(作家出版



社,1958年)。他将李白与许氏的结婚之年定在比王琦之说晚七年,即开元二十年(732),是年李白32岁。同时他还将李白隐居徂徕山的时期定在晚六年,即开元二十九年(741),李白41岁时。该考证的详细情况,在此不妨从略,但李白自开元十九年寓居安陆到出游齐鲁,其间竟长达十年之久,这一事实本身无疑就成为黄氏之说的依据了。

安旗、薛天纬的《李白年谱》(齐鲁书社,1982年)中有关李白与许氏结婚的年份是依从詹锓之说定在开元十五年。但隐居徂徕山的时期却依据黄氏之说,定为开元二十九年。

下面,我将有关李白隐居徂徕山被称之为“竹溪六逸”时期的年代的各家之说归纳为如下四说。即:

- | | | |
|--------|-------------|--------|
| ①薛仲邕说 | 开元十六年(728) | 李白30岁? |
| ②王琦等说 | 开元二十三年(735) | 李白35岁? |
| ③詹锓等说 | 开元二十四年(736) | 李白36岁 |
| ④黄锡珪等说 | 开元二十九年(741) | 李白41岁 |

三

李白隐居徂徕山作“竹溪六逸”之游时,他究竟多大年纪?上述四说中到底哪家之说最接近事实?

我认为解题的关键之一是在于查清六逸之一的孔巢父当时的年龄。《旧唐书·孔巢父传》中对“竹溪六逸”有如下记述。

巢父早勤文史,少时与韩准、裴政、李白、张叔明、陶沔隐于徂徕山,时号“竹溪六逸”。

《新唐书》有关孔巢父的记述就更简单了。只有“少力学,隐



徂徕山”七字。我们注意到两《唐书》均只用“少时”和“少”一词，但它到底意味着几岁却没有详记。

现在我根据两《唐书》和《资治通鉴》来简单地叙述一下孔巢父的经历。安禄山之乱时，永王璘举兵，欲召孔巢父为其麾下。但孔与欣然应命的李白不同，他预知永王必败而不予从命。孔巢父也由此而出名。此后，代宗时代他曾数次在朝中或地方任官，增长了才干。建中四年(783)，时值朱泚之乱，德宗从长安逃到奉天的时候，孔巢父多次献上破贼之计，由此受到德宗的赞赏。第二年亦即兴元元年(784)四月，魏博节度使田悦图谋反叛。孔巢父亲自闯入敌阵，充分发挥他那足智多谋和雄辩的才能。结果，田悦被其亲属所杀，叛乱也就此夭折。同年七月，看到河中节度使李怀光有叛乱的征兆，孔巢父禀承德宗旨意，再度闯入叛军根据地河中，企图说服对方。但李怀光已知晓田悦的结局，指示部下把孔杀了。

据《资治通鉴》所载，孔巢父被害于兴元元年(784)七月十八日。可令人遗憾的是，没有一份史料记下他遇难时的年龄。不过，下面一个事实却是值得注意的。即：孔巢父遇难的784年是李白谢世(762年)后的第22个年头。我们如果假定孔巢父是与李白同岁，那么，他当时该是84岁。然而，不管孔有多大本领或身体多么强壮，如此高龄而能闯入叛军的根据地，更于四月走魏州(河北省)，七月去河中府(山西省)，这难免让人难以置信。

在考证孔巢父的年龄问题上值得注意的史料中，有杜甫的《杂述》。这是一篇短文，全文只有260字，开头是“杜子曰，凡今之代，用力为贤乎？进贤为贤乎？进贤为贤，则鲁之张叔卿、孔巢父”。文中的张叔卿是不是“竹溪六逸”之一的张叔明，这无法确证。杜甫在该文中对张、孔两人虽具有非凡的才能，但一生不得志



极表同情。他说决不要气馁，“勉之哉，勉之哉”，以此来激励他们。最后用“载饮我蜀酒，载呼我为兄”结束了全文。

从文章中我们知道张、孔两人都比杜甫年轻。而且结句说“载呼我为兄”，“勉之哉，勉之哉”，从这结句的表现来看，他与张、孔年龄之差恐怕不是一二岁而是四五岁以上。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杜甫劝慰的语气中感觉到。

我们知道，杜甫比李白小 11 岁。现假定孔巢父比杜甫又年轻 5 岁的话，那么，孔和李白相差 16 岁。如果这个假设得以成立，那就是说孔巢父遇害时的年龄当是 68 岁。但想到他那可以称得上是东奔西跑的活跃身姿，也有很大的可能性孔巢父当时更加年轻一些。不管怎样，我们暂且保留这个 16 岁之差的说法。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李白在徂徕山作“竹溪六逸”之游的年代这一问题上。设想一下当时孔巢父的年龄。

薛仲邕说	李白 30 岁	孔巢父 14 岁
------	---------	----------

王 琦说	李白 35 岁	孔巢父 19 岁
------	---------	----------

詹 锬说	李白 36 岁	孔巢父 20 岁
------	---------	----------

黄锡珪说	李白 41 岁	孔巢父 25 岁
------	---------	----------

按《旧唐书》所载，孔巢父于“少时”与“竹溪六逸”诸人隐居于徂徕山。文中“少时”的提法其伸缩性究竟有多大，很难作出正确的结论，但至少可以排除 14 岁的说法。问题是 19 至 25 岁之说。上述年龄段的任何一个年龄用“少时”一词来表达，都是十分贴切的。但若以隐居徂徕山这一行为来考虑，可以说年岁越大有这种行为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而且他与李相差 16 岁之说尚且还是个低估的数字。如果考虑到孔巢父在他晚年仍那般活跃这一点，实际上他们两人的年龄之差可能还要大些。这样看来，上述四



说中李白游徂徕山时年龄比较大的说法更加接近事实。

四

综上所述,李白隐居徂徕山,被称之为“竹溪六逸”的年代还是尽可能假设得晚一些为好。为此,倘若从现在提出的四说中考虑其一的话,那么,作出李白在朝中供职的一年前已届 41 岁这个结论的黄锡珪、安旗、薛天纬诸氏之说,在目前情况下,其接近事实的可能性该是最高的了。

(笈文生)